

November 2017

A Study of the A-signifying Semiotics of Félix Guattari

Shubao D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Dong, Shubao. 2017. "A Study of the A-signifying Semiotics of Félix Guattari."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6): pp.177-18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6/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试论加塔利的“非能指符号学”

董树宝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法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的“非能指符号学”,针对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针对能指的暴政和霸权,加塔利吸收、改造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和皮尔斯的符号学,构建了符号化方式矩阵图,提出了“非能指符号学”,为主体性理论与精神分析批评提供了新视角和新维度,由之形成了基于“非能指符号学”的精神分裂分析批评。

关键词: 非能指符号学; 语符学; 符号论; 主体性; 精神分裂分析

作者简介: 董树宝,博士,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法国哲学与艺术哲学、中西比较哲学、西方文论研究。通讯地址: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邮政编码:100144,电子邮箱:plowman2009@163.com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表征、延异与生成”[项目编号:11YJC760015]阶段性研究成果,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形象的叛逆:法国当代哲学的艺术之思”[项目编号:12CZX079]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A Study of the A-signifying Semiotics of Félix Guattari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Guattari's a-signifying semiotics. He opposes Lacan's Structuralist psychoanalysis as well as the tyranny and hegemony of the signifier. By borrowing Hjelmslev's glossematics and Pierce's semiotics, he builds modes of semiotization, and develops the a-signifying semiotics, which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and dimension for the theory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and further forms a schizoanalytic criticism based on the a-signifying semiotics.

Keywords: a-signifying semiotics; glossematics; semiology; subjectivity; schizoanalysis

Author: Dong Shubao,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is main research area is contemporary French philosophy and art philosophy, Sino-Wester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ddress: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Email: plowman2009@163.com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MO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YJC760015), and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12CZX079).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为人类思考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人文与科学提供了新视角。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影响了一批思想家,极大地推动了这场“语言学转向”,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与索绪尔同时代的弗洛伊德,采用语言模式建立了精神分析学,《梦的解析》运用语言结构的分析方式“解析”了梦,成为精神分析学的

代表性著作之一。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拉康呼吁“重返弗洛伊德”,将结构主义应用于精神分析学,提出了“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重要命题,建立了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

作为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 1930年-1992年)早年曾受业于拉康,接受了拉康长达7年的精神分析训练,深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他以拉博

德诊所为实践平台,以精神分裂分析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了当代语境中的主体性问题,为我们绘制了主体性研究的新轨迹。他以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和皮尔斯的符号学为理论基点,融合了语符学、符号学与精神分裂分析,逐渐发展出一种截然不同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神分裂分析语言学,为精神分析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资源。如若说拉康以索绪尔的符号论(sémiologie)为基础建立了精神分析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由之发展出具有结构主义特色的精神分析批评,那么加塔利以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的语符学(glossématique)和皮尔斯的符号学(sémiotique)为基础建立了精神分裂分析语言学——“非能指符号学”(sémiotiques a-signifiantes),由此形成了具有后结构主义特色的精神分裂分析批评。^①

一、主体性与语言分析

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思想界重新发现了索绪尔,拉康、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巴尔特、德里达等思想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索绪尔的符号论,试图构建一种截然不同于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范式,由此形成了法国当代精彩纷呈的、极具活力的理论景观。“每个人重新发现了具有相似关系的问题、方法、答案,好像共享了时代的自由氛围、时代精神,不过每个人可以根据他们在各自领域所进行的奇异的发现与创造得到衡量”(Deleuze, *L'Île Déserte Et Autres Textes* 238)。在这一时代氛围下,加塔利与德勒兹相遇,开启了两人以二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合作模式,当时他们不得不面对结构主义浪潮的冲击,探索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学范式。加塔利在与德勒兹合作之前虽然使用结构、能指等词汇,但他对索绪尔的符号论持怀疑态度,对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实践有所不满,他尝试着将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应用于精神分析实践,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精神分析语言学。“如若菲利克斯在此,他或许另有高见。菲利克斯的确洞察到一场逐渐改变语言学的运动:语言学首先是音位学,然后是句法学和语义学,不过语言学越来越变成一种语用学”(Deleuze, *Pourparlers* 43)。加塔利敏锐地洞察到这场改变语言学的运动,不断地援引索绪尔、叶姆斯列夫、

本维尼斯特、皮尔斯、乔姆斯基等语言学家的理论,尤其是从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和皮尔斯的符号学获得灵感,探索了语言之于主体性产生的意义,建立了独具特色的“非能指符号学”,这对他与德勒兹合作撰写的《反俄狄浦斯》《卡夫卡》《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学就与语言学产生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拉康更是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发挥到极致。“拉康的理论可以表述为两点,其中每一点都同无意识概念有关,都同无意识的东西和对主体概念的关系有关:——无意识的东西是像语言那样构成的;——主体的无意识的东西就是‘另一个人的言语’”(克莱芒 17)。无意识通过语言建构了主体性,无意识、主体性和语言的关系成为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核心主题。拉康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决定语言的观点,他认为不是无意识决定主体性,而是语言结构决定主体性,因而无意识是语言的产物。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混乱的、盲目的,而拉康认为“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是有规律的、有结构的,“不仅人讲话,而是在人身上,通过人,话在讲,他的本质变成由语言的结构显示其中的效果,他成了语言结构的素质,由此而在他身上回响着言语的关系”(拉康 591)。每个主体都要服从语言结构,是语言符号使其成为主体,因此主体性不再是人的内在属性,而是一种语言建构的结果。拉康通过分析无意识、语言和主体的关系,阐释了语言、他者对主体性形成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否定了笛卡尔以来“我思”的主体性理论,发展了颇具文化色彩的主体性理论。

本维尼斯特曾受拉康之邀撰写了《精神分析与语言的功能》,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语言是精神分析的媒介,正是通过语言建构了“病人”这样一个主体,寻找弗洛伊德所谓的“情结”。“精神分析学家进行治疗的依据就是病人这个主体对他说的话,他通过病人对他说的话来观察病人,通过病人的言语行为(‘虚构’行为)来研究病人。而透过这些话语,他会逐渐看出需要他去解释的另一番话,埋藏于病人无意识中的某个情结。治疗的成功正是取决于能否将这个情结揭示出来,而且如果治疗成功的话,那就会反过来证明推断的正确。因此从病人到精神分析学家,从精神分析学家到病人,整个

过程都是通过语言的媒介来进行的”(本维尼斯特 98)。根据病人的话语,精神分析学家以逆推的方式来寻找病人记忆中被掩埋的、被忽视的“历史”材料,探究和解释病人的病因。在本维尼斯特看来,精神分析是关于语言的分析,主体性通过语言得以建构,与拉康的主体性理论不谋而合。“首先,我们遇到的是言语的世界,即主体性的世界。纵观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我们感觉到主体是利用言语和话语来做自我‘描述’,他想怎样看自己就怎样看自己,他让‘他人’怎样看他就让‘他人’怎样看他”(本维尼斯特 99)。他在《论语言中的主体性》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人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因为,实际上,唯有语言在其作为存在的现实中,奠基了‘自我’的概念。我们在这里论述的‘主体性’,是指说话人自立为‘主体’的能力[……]尽管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这一主体性放在现象学或心理学范畴,那只不过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性在人身上的体现。‘言说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主体性’的根本所在,它是由‘人称’的语言学地位确定的”(本维尼斯特 293-94)。因此,主体性通过语言的使用或占有得以确立,通过“人称”的语言学得以确立,这成为语言的基本特性之一。“语言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每个说话人都自立为主体并同时在言语中将其自身成为‘我’”(本维尼斯特 294)。主体性的基础是语言的使用,语言使主体性成为可能。

加塔利与德勒兹在《千高原》中不仅批评了精神分析的语言学陷阱,而且也批评了本维尼斯特的“人称”语言学。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不惜一切代价期待着在种种不确定之后有一种被隐藏的确定的东西、一种所有格、一种人称”,“甚至连语言学本身也不是不受同样偏见的影响,既然它是与人称学密不可分的;不仅不定冠词和不定代词,而且第三人称代词似乎也缺乏前两个人称特有的主体性的规定,而这一规定被当作所有表述的必要条件”(Deleuze and Guattari, *Mille Plateau* 323-24)。他们不同意本维尼斯特对第三人称的观点,认为第三人称不再把陈述(énoncé)与表述主体(sujet d'énonciation)联系起来,而是将陈述与作为条件的集体性装配(agencement collectif)联系起来,“第三人称‘他’(IL)不再现主体,而是使装配图表化”(Mille Plateau 324)。表述

(énonciation)和陈述(énoncé)本是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区分,énonciation是指与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讲话行为,用来研究话语(discours)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运作,énoncé是指这一讲话行为的结果。拉康借鉴了这一区分,并将énonciation与无意识、énoncé与意识联系起来,提出了分裂的主体——表述主体和陈述主体(sujet de l'énoncé),显然加塔利是在这一理论谱系中使用了这两个术语,尤其强调了énonciation,提出了与主体性生产密切相关的表述装配(agencement d'énonciation)理论——“表述的辖域化装配”“表述的解域化装配”与“表述的过程性装配”。总而言之,表述的辖域化装配大致对应于前现代社会,关系到一种原-审美的范式和集体的辖域化的主体性,出现了复调的、块茎的价值化;表述的解域化装配大致对应于现代社会,构建了超验自律的真、善、美、资本,关系到主体性的个体化,出现了两极化和等级结构;而表述的过程性装配对应于未来社会,具有审美范式的机器性维度、过程性维度和自创生维度(Guattari, *Chaosmose* 138-51)。因而,加塔利将主体性思考在语言学维度上与装配联系起来,体现了不同于本维尼斯特和拉康之于主体性的语言分析,为我们思考主体性的产生提供了新维度,为加塔利的“非能指符号学”开拓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二、绕道语符学理论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什么是哲学?》中将“哲学王子”的殊荣授予了斯宾诺莎,而“语言学王子”的称号非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莫属。叶姆斯列夫是哥本哈根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立的语符学被认为是最艰深晦涩的语言学理论之一。加之他的代表性著作《语言理论绪论》以丹麦文写成,影响范围极小,最初仅限于丹麦语言学界。因此,语符学长期以来没有引起思想界的关注,其理论的光辉一再被遮蔽。1946年,法国语言学家A·马丁内发表了《评L.叶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绪论〉》,介绍了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这对法国日后的叶姆斯列夫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1965年,叶姆斯列夫逝世,这成为一个转折性事件,在以A·J·格雷马斯为核心的语言小组的积极推动下,法国语言学家和符

号学家纷纷关注语符学,促进了语符学的广泛传播,由之促成《语言理论绪论》法译本于1968年出版。巴爾特的《符号学原理》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巴尔特 47),改造了叶姆斯列夫关于内涵与元符号学的区分,发展了一种内涵符号论。巴尔特只是简要地对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进行了研究,然而他的文学才华还是将语符学演绎得淋漓尽致,获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从理论渊源上看,叶姆斯列夫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影响颇深,他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形式与实体的二元对立观点,同时加以创造性地应用和发挥。他吸收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和价值理论之精髓,强调了索绪尔的两句话:一句是《普通语言学教程》最后一句话:“语言学真正的、唯一的对象是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 323),这也是他提出语言内在性的重要依据;另一句就是“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索绪尔 169),^②这句话对他影响最大,成为语符学核心观点之一。他肯定了索绪尔语言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索绪尔的观察在语言研究方面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此,索绪尔本人不得不同传统的看法进行斗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普通语言学的讲稿只是他在他所开辟的崭新的道路上,为实现他的新观点所进行的斗争的结果,而不是他最后形成的观点的定稿”(叶姆斯列夫,《语言研究中的结构分析法》17)。他以其独特的语符学视角阐释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至于我的理论,那是在许多年以前就开始形成了的。当时我还没有接触索绪尔的理论。后来我反复地阅读索绪尔的讲稿,证实了我的许多观点。当然,我是以自己的观点看待索绪尔的理论的”(18)。在叶姆斯列夫看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只是新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加塔利与德勒兹解读出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对立的,“从各种观点看,尽管是表面上,我们认为,叶姆斯列夫的语言学与索绪尔的和后索绪尔的事业完全对立”(Deleuze and Guattari, *L'Anti-Œdipe* 288)。由此,加塔利与德勒兹不同于巴尔特所理解的叶姆斯列夫,他们将语符学理论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形成了精神分裂分析语言学,也就是加塔利孜孜以求的“非意指符号学”。

叶姆斯列夫始终践行着索绪尔“语言是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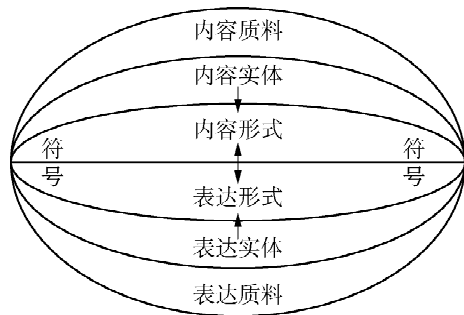


图1 语言符号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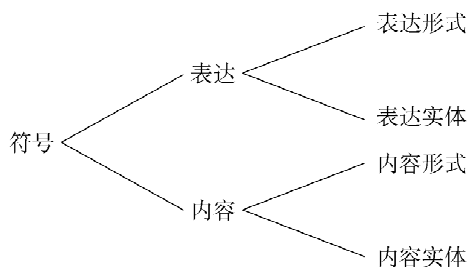


图2 语言符号结构示意图

而不是实体”的理念,不满于索绪尔关于“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的结论,因为能指是指音响形象,与物理声音相联系,所指是指事物的概念,与意义相联系,能指和所指都是实体,因而这一结论与索绪尔的理念相背离,没有达到形式化的要求。因此,叶姆斯列夫认为有必要在索绪尔开辟的“崭新道路”上继续前进,于是他将符号功能区分为“表达”(expression)与“内容”(contenu),两者与“质料”(matière)、“实体”(substance)和“形式”(forme)相互交叉,形成了“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内容形式”和“内容实体”“表达质料”和“内容质料”(见图1与图2)。^③虽然叶姆斯列夫的一些概念来自于索绪尔,但含义已发生很大变化,这在加塔利的分析和阐释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叶姆斯列夫认为,意义未被符号学建构之前,存在着未定形的、未被结构化的、未被层化的或者去层化的“质料”,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模糊的实体”。质料就像沙土一样,在不同的模型中以不同的方式构形。“这就像相同的一把沙可以变成不同的形状,或者像哈姆雷特所见的天空中那种形态不时变换的云团”(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170)。也就是说,“质料”要构形为实体,否则就不能存在。因此,内容质料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形成内容实体,同样表达质料也会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形成表达实体。至于形式的论

述,叶姆斯列夫也运用了一个比喻,他认为形式“是被投影到质料上,犹如一张张开的网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浑然未分的水面上一样”(《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175)。这个比喻加塔利也曾在《分子式革命》一书中引用过(Guattari,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78),他详细分析了质料、实体与形式。其中“质料”就是“浑然未分的水面”,“张开的网”就是实体,而形式与影子一样是抽象的,它不是网,而是网的影子。至于实体,“实体不是语言形式的必要前提,但语言形式是实体的必要前提”(《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175),叶姆斯列夫指出形式是常量,占据绝对优势位置,而实体是变量,从属于形式。形式具有独立自主的特点,形式成为语符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一切都必须从形式入手,而非从实体开始,因此叶姆斯列夫认为符号由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构成。在加塔利与德勒兹看来,叶姆斯列夫是唯一与能指和所指真正决裂的语言学家,因为内容形式不属于所指,同样表达形式不属于能指(*Mille Plateau* 85)。虽然索绪尔突出了形式研究,但他没有忘记实体的研究,而叶姆斯列夫完全走向了极端,走向了形式化,由此语符学致力于研究语言形式,完全忽略实体,成为一种“语言代数学”。

叶姆斯列夫曾在《语言理论绪论》开篇描绘了语言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强调了语言与主体的相互作用,强调了语言对主体性形成的重要作用,强调了语言赋予主体的思想和行为以符号化、形式化的功能,影响“人类形成思想、情感、情绪、愿望、意愿和动作”,影响主体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121)。不过他对具体的语言实践不感兴趣,他将语言界定为一种特殊的、自主的结构,界定为一种范畴之间具有依赖关系的网络,这是一种内在性语言,是不同于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或者说是重新解释了索绪尔的语言概念。他视语言为纯粹形式,而非实体,使语符学成为一种高度抽象化的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语符学的高度抽象化特点契合了加塔利的理论需要,他运用叶姆斯列夫的概念和范畴不过是为了“绕道语符学”而进入精神分裂分析。在与德勒兹相遇之前,加塔利在1966年—1967年撰写的重要论文《因果性、主体性与历史》(*La causalité, La Subjectivité Et*

l'Histoire)中提及了叶姆斯列夫,并在注释中指出他的符号观念更接近语符学(Guattari, *Psychanalyse Et Transversalité* 180)。在《反俄狄浦斯》的写作过程中,加塔利不断地阐释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甚至逐行逐字地读解了《语言理论绪论》,我们可以在Stéphane Nadaud编辑的加塔利书信集《反俄狄浦斯论文》中清楚地看到这一尝试。在加塔利看来,叶姆斯列夫“与其说是一名语言学家,不如说是一名哲学家”(Guattari, *Écrits Pour L'Anti-Œdipe* 309)。加塔利(与德勒兹)甚至在《反俄狄浦斯》中宣布: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是“惟一的同时适应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分析的流的本性的语言学:直到现在,惟一的言语活动的现代的(而非古代的)理论”(Deleuze and Guattari, *L'Anti-Œdipe* 289)。

三、非能指符号学

根据叶姆斯列夫的“表达”和“内容”与“质料”“实体”和“形式”五个范畴,加塔利绘制了符号化方式矩阵图(见图3[Guattari,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79]),对这五个范畴进行重组,以摆脱能指在建制中的设定。在这一矩阵图中,表达与内容的区分被一种有关质料、实体与形式的三元体重新切分,最终“能指符号论”(sémologies signifiantes)在“表达”与“内容”“实体”和“形式”相互交叉的四个方格中发挥作用,而符号学启用了未在符号学上成形的质料的两个维度:一是作为“表达质料”的意义,一是作为“内容质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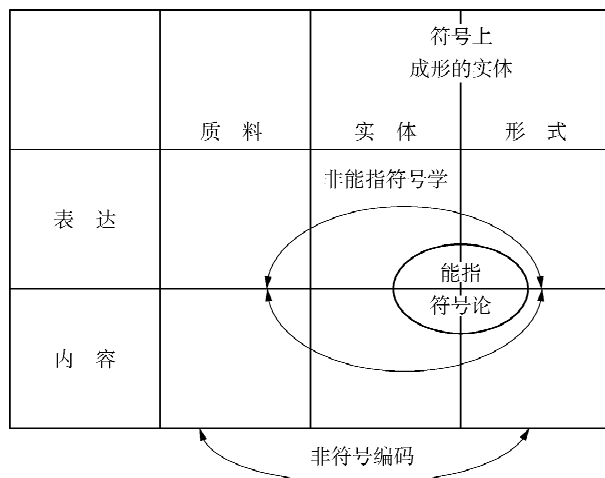


图3 符号化方式示意图

质料流的连续统 (Guattari,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78)。当时格雷马斯、罗兰·巴尔特等语言学家没有意识到叶姆斯列夫关于表达与内容这一区分的独特性,仓促地吸收进索绪尔所创立的符号论体系之中。未在符号学上成形的质料与在符号学上成形的实体之间的区分并不取决于基于能指与所指之区分的能指符号论,这为加塔利的“非能指符号学”开辟了道路。

根据编码方式,加塔利区分了“非符号编码”(encodages a-sémiotiques)、“能指符号论”与“非能指符号学”(sémiotiques a-signifiantes),前两者分别对应于他前面所区分的未在符号学意义上成形的质料与在符号学意义上成形的实体,而“非能指符号学”对立“能指符号论”,是加塔利持续探索的精神分裂分析语言学。加塔利借鉴生物学的研究来阐释“非符号编码”,例如“基因编码,或任何所谓的自然编码,完全独立于符号实体的构造而运行”,“编码的这些方式使质料的强度形式化,不再诉诸于自主的、可转译的‘书写’(écriture)”(*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79)。从图3来看,“非符号编码”处于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之外,关系到质料与形式,与实体无关,也不讨论符号实体。“加塔利运用叶姆斯列夫的概念创造了一个新的编码范畴:假如在符号学意义上成形的质料是实体,那么非符号编码就是未在符号学意义上成形的质料。加塔利‘没有基因的书写’的论断意味着‘自然的’非符号编码不能在特殊的符号实体或层上被总体化或辖域化”(Genosko 166-67)。没有符号实体,“非符号编码”也就不能直接转译为另一个符号系统。以图表来绘制DNA链的生物学家把各种结构转入符号系统,从整体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表达载体,这是完全不同于“能指符号论”转换信息的方式。

相对于“非符号编码”而言,“能指符号论”^④被建立在符号系统、符号学意义上形成的实体的基础之上,而且这些实体在内容和表达的双重平面上维持着形式化关系。“能指符号论”可区分为“象征符号论”与“意义符号论”,前者以层的多样性为依据,牵涉到一些符号实体,例如古代社会中存在的手势符号、摹拟符号、姿势符号、纹身符号、仪式符号等,不过符号流通是去中心的,从不在普遍意义的系统中被转译,因而符号实体相互交叠,相互指涉,保存了某种自主的界域性。如若

说“象征符号论”是去中心化的、未被辖域化的,那么“意义符号论”就是中心化的、被辖域化的,出现了“能指的专制”(dictature du signifiant)(Guattari,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80),以单一的能指实体为中心控制和超编码全部表达实体。“能指的爱好者将简单的情境视为暗含的模型:词与物,他们从词提取能指,从物提取所指,而所指与词相一致,因此屈从于能指”(Deleuze and Guattari, *Mille Plateau* 86)。能指具有极权主义的特性,操纵、控制了所有其他的多中心的符号实体。看似符号机器在内容得以形式化的层与表达得以形式化的层上发挥作用,实则不存在这两种层,只有唯一的能指得以形式化的层。以能指-所指二分的能指符号论使符号的三重功能发挥作用:指称功能、再现功能和意义功能。在任何情况下,符号不能直接指涉现实,须经由再现才产生意义。“经由再现,全部的生产性连接综合才在被指称的(被指示的)实在与影像的世界、再现的、图形的或者相关的世界之间被区分。这些影像的集合建构了那适合称之为精神世界的东西。意义产生于能指载体与这一再现和这一再现本身的关系”(Guattari,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55)。正是能指与所指的二重切分的幻觉在支撑再现平面的虚构时消除了能指机器上出现的、具有强度的多样性。因此内容的形式化产生了与实在隔绝的主体性、虚空的和本身透明的主体性,这正切合了拉康式的主体性理论——能指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主体。主体发生了分裂,出现了表述主体和陈述主体,由此摧毁了表述的多形态性。“经由一种化约论的言语摹仿症的效果,陈述主体被变成表述主体的担保者”(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56)。显然这是语言学家的俄狄浦斯情结化,是语言学家努力达到的目标,而加塔利感兴趣的则是在陈述主体中维持表述过程,致力于探求“集体的表述装配的迹象、残余痕迹、横贯性逃逸”(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56-57),以达到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由之他提出了“非能指符号学”。

“非能指符号学”是加塔利孜孜以求的精神分裂分析语言学,是其最重要的符号化方式。通过图3,我们会看到“非能指符号学”环绕着“能指符号论”,在形式与质料之间形成了环状式关联。“非能指符号学”处于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在这

一点上不同于“非符号编码”。不过“非符号编码”“非能指符号学”都与实体无关,而且“非能指符号学”也不依赖于“能指符号论”,两者之间不存在从属的等级关系。“非能指符号学”区别于“意义符号论”,关系到“后能指符号学”(sémiotiques post-signifiantes),例如数学符号的机器,关于科学、艺术、音乐、经济的技术符号的复合体,革命的分析机器。“非能指符号学”可以利用“能指符号论”作为符号解域化的工具,以便在符号流与质料流之间建立起新联系,不过这种关联性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或屈从关系。“非能指符号学”要逃离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结构,逃避所指的抽象化,打碎那种被界定为永远反对其他符号的否定性和区别性身份,挑战了能指的专制和盲目崇拜(Genosko 166)。在加塔利看来,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一种“能指符号论”,导致一个辖域化的过程,导致了能指的专制和霸权,而他所追求的是一种“非能指符号学”,旨在摧毁能指的专制和霸权,是一个解辖域化的过程,最终重新组织和建构符号机器与质料流的关系。

在“能指符号论”的语境中,能指机器被建立在再现系统之上,源自于能指与所指之连接的意义效果陷入了罪恶的循环,符号流与质料流在再现领域中被中立化。能指不停地指涉能指,以致实在与符号论被完全隔离。根据拉康的论述“能指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主体”,主体性在这一能指机器中被个体化,徘徊于符号的解域化过程与意义和解释的再域化过程之间。“非能指符号学”改变了这一困境,使再现系统失去超编码和中心化的功能,由之符号与事物相互装配,符号流与质料流相互连接,创造了非能指的集体的表述装配。从个体的表述主体向集体的表述装配,加塔利描述了“能指符号论”向“非能指符号学”的转变,在个体-集体的关系上阐述了意义问题。“意义来自一种意识返回自身的运动,来自一种向再现性图像的折叠,来自一种与机器性连接的断裂。集体的表述装配不管怎样都能保持毫无意义(signification),并从‘直接’创造流的析取中汲取(例如历史的或诗学的)意义(sens)[……]总之,等式‘所指’+‘能指’=‘意义’(signification)属于幻想的个体与屈从群体的范围,而等式‘集体的表述装配’=‘机器性的意义-非意义(sens-

non-sens)’属于群体幻想与主体群体的范围”(Guattari,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60)。因而,“能指符号论”是再现的观念论,意义总是关系着自身指涉,“非能指符号学”是生产的现实论,总是创造新的连接和可能性。

在加塔利的“非能指符号学”的构想中,他改造了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来反对索绪尔的能指符号论,以质料-实体-形式的三元体来反对能指-所指的二元切分。他重点关注的是实体在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上的“符号功能”,尤其是叶姆斯列夫关于未在符号学意义上成形的质料的观点。加塔利突出了质料在语符学中的独特地位,将叶姆斯列夫的内容与表达的二元切分凸显为质料-实体-形式的三元体,寻找一种动态的、解域化的表述装配。未在符号学意义上成形的质料就像可以变化为不同形状的沙土一样,实体的出现是形式投射到质料的结果,就像一张张开的网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浑然未分的水面上一样。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叶姆斯列夫的内容与表达的区分和索绪尔的所指与能指的区分存在着某种同构性,尚未完全摆脱“能指符号论”的超编码观念,带有某种中心化、等级化的倾向。鉴于叶姆斯列夫的理论不足,加塔利借用了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图表化”(diagrammatisation)理论来进一步阐述“非能指符号学”。在皮尔斯的诸多三分法中,加塔利择取了符号的第二种三分法,“可以把符号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与规约符(symbol)”(皮尔斯 72)。像似符是指符号与对象的相像或相似,可以代替对象;指示符是指符号与对象是动态的、指示性的关系,可以指示对象;规约符也就是象征符号,它借助一般约定俗成的观念指示对象。像似符、指示符与规约符是符号的三个方面,对应于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的三分构造,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解释过程。加塔利修改了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提出了像似符的组成成分(composantes iconiques)、指示符的组成成分(composantes indiciaires)和编码的组成成分(composantes d'encodage)(Guattari, *L'Inconscient Machinique* 206-209),描述了符号的各组成成分之间的动态关系。然而加塔利与德勒兹在《千高原》中肯定了皮尔斯是“符号学的真正革新者”,但也洞察到了皮尔斯的像似符、指示符与规约符仍然“立基于能指-所指的关系之上”,致使把“图

表”(diagram)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像似符(Deleuze and Guattari, *Mille Plateaux* 177)。为此加塔利通过区分图表与像似符来发展图表化理论,认为图表不需要通过“能指符号论”就可以连接解域化的质料流,最终在符号流与质料流之间建立起动态的关系,建立了基于集体的表述装配为根基的“非能指符号学”。

“非能指符号学”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理论针对性,是加塔利建构精神分裂分析的理论依据。20世纪50、60年代,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曾主导了当时的精神分析实践,采取的是语言主导的阐释模式,或者说是能指主导的阐释模式。在具体的精神分析实践中,加塔利发现弗洛伊德和拉康将治疗实践限定在语言媒介之中,为此他在乌尔兄弟的影响下提出了“建制性分析”(analyse institutionnelle),试图研究复杂语境中的主体性生产问题。“建制性分析”有时能够有效地使非能指符号机器面向欲望生产工作,产生了一种比精神分析更加模棱两可的、更加开放的“欲望微观政治学”,不过这种疗法没有摆脱精神分析的“能指的专制”,依然监控着无意识的一举一动,强化了与精神分析导师的认同和模仿机制。而精神分裂分析则要抛弃这种所谓的“建制性分析”,认为重要的不是以能指和导师为核心,而是促进符号的多中心主义,其目的“决不复原那些外在于规范的事实与行动,反而取代主体的特异性,而这些主体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因由逃避日常法则”(Guattari,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284)。精神分裂分析以“真正的分析实践”谴责精神分析,谴责精神分析的“滑动的能指”,寻求“符号的多中心主义”,反对“能指符号论”的总体化和中心化,反对主导的社会法则对主体的规训与监视,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主体性生产提供了场所。如若说传统精神分析强化了“能指的专制”,是主体从“前能指符号论”到“能指符号论”的过程,超我的形象和罪恶感压制了欲望和快感,压制了主体性的形成,那么精神分裂分析则要消除能指的权力构成,是主体从“能指符号论”到“非能指符号学”的解域化过程,支持“无器官身体”,解放了欲望,解救了主体性,从而为主体性生产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总之,在“非能指符号学”的艰难探索中,加塔利博取众家之长,以其独特的装配思维方式,对

各种理论进行“装配”,试图在表述的过程性装配中探求未来审美方式的机器性维度、过程性维度与自创生维度,以等式“集体的表述装配=机器性的意义-非意义”取代等式“所指”+“能指”=“意义”,改变了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共生状态,实现了从精神分析向精神分裂分析的转变。昔日执着于能指与所指之二元切分的索绪尔变身为沉思质料-实体-形式的叶姆斯列夫,静观哥本哈根上空风云变化、忧心忡忡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也幻身为冷观“城堡”隐秘玄幻、始终精神分裂的“文学王子”卡夫卡,哈姆雷特被抑制的、基于再现模式的俄狄浦斯情结破碎了,取而代之的是卡夫卡生产性的、基于非再现模式的反-俄狄浦斯情结。在不断指向未来的逃逸线上,那个被欲望问题纠缠一生的奥地利人弗洛伊德经由结构主义的洗礼生成了持续解域的、到处游牧的法国人加塔利,精神分析在持续被差异化的过程中走向了精神分裂分析。

注释[Notes]

① 符号论(sémiologie)与符号学(sémiotique)代表了符号学研究的两条路径: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了符号论,侧重人类文化内部起作用的符号的研究,经由拉康、巴尔特等欧陆理论家继承发展,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结构主义运动;19世纪末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从逻辑学的角度提出了符号学,侧重符号本身和符号功能的研究,后经莫里斯(C. W. Morris)等美国理论家继承发展,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符号学研究。参见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张组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第160-71页。

② 该处译文原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据《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将“实质”改为“实体”。参见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yot & Rivages, 1995) p. 169。

③ 图1与图2,参见王德福:《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9、229页,有所改动。

④ “能指符号论”在加塔利的思想体系中经过了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他又将其命名为“意义符号论”(les sémiologies de la signification),包含“象征符号论”(sémiologies symboliques)与“能指符号论”,后来确定为“能指符号论”,包含“象征符号论”和“意义符号论”。具体参见 Guattari,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Paris: Recherches, 1992) pp. 253-64, pp.

279-90。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王东亮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Benveniste, Émil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Wang Dongliang, et al.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C. 克莱芒：《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金初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Clemeng, C. . *For a Marxist Criticism of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Trans. Jin Chugao.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Deleuze, Gilles. *Pourparlers*. Paris: Minuit, 1990.

---. *L'Île Déserte et Autres Textes 1953 - 1974*. Paris: Minuit, 2002.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L'Anti-Œdipe*. Paris: Minuit, 1972.

---. *Mille Plateaux*. Paris: Minuit, 1980.

Guattari, Félix. *Psychanalyse et Psychanalyse et Transversalité Transversalité*. Paris: François Maspéro, 1977.

---. *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Paris: Recherches, 1977.

---. *Chaosmose*. Paris: Galilée, 1992.

---. *Écrits pour L'Anti-Œdipe*. Paris: Ligne, 2012.

Genosko, Gary. *Félix Guattari: An Aberrant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路易斯·叶姆斯列夫：“语言研究中的结构分析法”，王兴权译。《语言学资料》11-12(1962)：16-19。

[Hjelmslev, Louis. “The Analytic Method of Structure in Linguistic Study.” Trans. Wang Xingquan. *Linguistic Documents* 11-12(1962)：16-19.]

——：《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程琪龙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

[---. *The Essays of Hjelmslev's Glossematics*. Trans. Cheng Qilong.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2006.]

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Lacan, Jacques. *Écrits*. Trans. Chu Xiaoquan.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查尔斯·S·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Peirce, Charles Sanders. *Semiotic Theory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rans. Zhao Xingzhi.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弗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Gao Mingk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责任编辑：王嘉军)